

# 理论、历史、现实： 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三重维度

陈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1602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发展“一个结合”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从理论维度看,“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内在联系的深刻昭示,二者诠释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从历史维度看,“两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第一次结合”到“第二次结合”、从“一个结合”再到“两个结合”的百年流变;从现实维度看,“两个结合”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唯有高扬伟大旗帜、立足鲜活实践、赓续传统文化,切实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来准确把握“两个结合”这一科学论断,才能认清机理、明晰历史、观照现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关键词:** 两个结合;理论;历史;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3.03.003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3)03-0019-08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犹如“壮丽的日出”,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尤其深刻影响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指导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并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发展。回望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不禁深思: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何以能够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得到卓越发展,并彰显出磅礴生命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出过答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sup>他在继承发展“一个结合”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

这一重大论断提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两个结合”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哲学意蕴、历史贡献、实践启示等,有力推动了“两个结合”研究的深入。但要彻底厘清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还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历史、现实的“横纵贯通”,唯如此,才能准确把握“两个结合”这一科学论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一、理论维度:“两个结合”诠释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

收稿日期:2023-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项目(19VSI150)

作者简介:陈鑫(1992—),男,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sup>[2]17</sup>。其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联系的深刻昭示。二者都遵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根本”,体现了“两个结合”的“一本两基”(根本、基石、基因)的理论样态,有力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

### 1. “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不拘泥于前人理论,不局限于主观世界,而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之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其中所蕴含的关于自身创新发展、实践运用、呈现形式等规律,也内在要求着“第一个结合”。

就创新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因此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这一理论便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实际”二字便出现了11次。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章节中还利用大量篇幅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强调“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sup>[3]57-58</sup>,以此说明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场

域,“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3]5</sup>。脱离社会具体实际的理论,最终只能成为丧失现实指导意义的“纯粹文献”。针对俄国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sup>[4]466</sup>,马克思曾严肃地指出:“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4]466</sup>。这就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要从世界各国各民族实际情况出发,始终注重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就实践运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5]</sup>,马克思从哲学功能的视角阐释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更要成为指导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对此,恩格斯在给维尔纳·桑巴特等人的信中也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6]</sup>通过上述重要论断,我们可以清晰读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共同强调的一种鲜明态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套指导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而非僵化教条,决不能将其“本本化”、教条化,视作一成不变的僵化学说,而是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真正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将其视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就呈现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穿上本国的服装”。19世纪中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全人类利益为理论起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而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出场便带有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普遍性与一般性。但这种一般性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域,与当时当地的民族形式、地域形式相结合,并以特殊的、具体的理论形态得到呈现,否则这种没有“特殊”“个性”的僵化“共性”,必然会滑向超历史的神秘主义,成为教条主义者的虚伪信条。为此,恩格斯曾针对美国工人运动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sup>[7]</sup>。在此,恩格斯以“脱掉外国服装”“穿上本国服装”的形象比喻,强调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思维方式等进行深度融合,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关怀能力,推动这一理论实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2.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内在联系的深刻昭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一个国家永葆凝聚力、向心力的坚强纽带。由于地域、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民族形成的文化也存有差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孕育形成了灿烂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这种具有典型性的东方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个个体,并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两种文化,无论是在理论起源上还是在内容特点上,都存有明显差异,但二者却在神州大地上实现了契合融通,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共通性和互补性。

所谓共通性,是指两种文化间的契合融通,这既体现在价值追求之中,也表现在根本立场

之上,更彰显于实践方式之内。就价值追求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追求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之相呼应,中华文化追求建立“大同”社会,认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sup>[8]</sup>,这表明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根本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根本政治立场,与中华文化中“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本思想不谋而合;就实践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以实践改造世界,在实践中实现自我革新。而中华文化同样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同样秉持“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二者在崇尚开放性、包容性,注重实践性、创新性上有着高度契合。正是这种在价值、立场、实践上的共通性,为两种文化的契合提供了可能与基础。

所谓互补性,是指两种文化的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在遥远的中华大地创造出人类社会发 展奇迹,这既得益于两种文化互通性的契合融通,也得益于二者互补性的相得益彰。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激发了中华文化的活力。近代以来,囿于国力羸弱,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西方欺凌中逐渐衰落,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甚至一度将其与封建腐朽制度相并列,认为中华文化是导致近代中国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并倡导“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华文化。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其基本原理的启发下,既看到了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也发现了中华文化中所存在的优秀文化精华,进一步激活了其内在发展活力。另一方面,

中华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内含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文化品质,并以其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吸收借鉴了人类社会其他文明成果。这种丰富的内涵和包容的品格,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与基础,同时更促进了这一理论在中华大地上的生根发芽,最终“穿上中国的服装”,融入中国话语体系,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 二、历史维度:“两个结合”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流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sup>[9]</sup>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便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从“第一次结合”到“第二次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性转变。

### 1. 从“第一次结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到我国后,如何让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便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他首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但同时也要立足中国实际,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僵化教条“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全然不顾“时代环境”<sup>[10]</sup>。这就鲜明提出了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为“第一个结合”的雏形。

但令人惋惜的是,李大钊这一宝贵思想不幸夭折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也正因如此,党内少数成员便认为,由于我们党成立不久、经验不足、力量弱小、根基未稳,不仅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更要坚决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错误认知的出现,在我们党成立之初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后愈演愈烈,甚至一度演化为全盘接受共产国际意见、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令,最终导致我们党惨遭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等重大挫折。

惨痛教训和重大失利使我们党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固然重要,但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样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其中,毛泽东就是坚定支持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针对红军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sup>[11]</sup>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未得到党内成员的认可和接受,党内指挥权仍被“本本主义者”所掌握,甚至有人因此讥讽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者”。在此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便成了必然。

直至遵义会议后,党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思想才开始逐渐消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此找到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成功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 2. 从“第二次结合”到“一个结合”的思想成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百

废待兴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人亟待从领导革命向推进建设转变,亟待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将目光投向苏联,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也正是在苏联的指导帮助下,我国快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较快地建立起了相对独立、较为完整的国民工业和经济体系。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照搬苏联经验、照抄苏联模式等问题,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大跃进”等挫折与挑战。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理性分析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建设之路。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第一次结合”的成果,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sup>[12]</sup>。“第二次结合”的提出,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对“怎样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正确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问题的科学认识: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党赓续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但令人遗憾的是,“第二次结合”的正确理论和路线未能得到顺利推进,尤其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干扰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正确发展轨道。

直到1978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分析并批判党内存在的思想路线问题,指出一些党员干部机械理解毛泽东思想,忽略甚至抛弃其中最为宝贵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等观点方法。因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sup>[13]</sup>,这就进一步坚持并发展了“第二次结合”。随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sup>[14]</sup>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进一步强调,“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sup>[15]</sup>,继续将这一思想向前推进。

纵观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了“第一次结合”与“第二次结合”的有机统一,逐步推动了“两次结合”向“一个结合”的转变,共同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 3.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凝练升华

“两个结合”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早在“两个结合”明确提出之前,“第二个结合”便已蕴含在“第一个结合”之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烈批判了“言必称希腊”式的数典忘祖现象,强调学习“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sup>[16]</sup>。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样极其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认为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sup>[13]358</sup>,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执政理念中去。譬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用以纠正党内“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进而提出“与时俱进”伟大命题。又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结合,提出了

“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江泽民、胡锦涛同样注重两种思想文化的结合,并依据中华文明中的“德治文化”与“和合思想”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和谐社会”等新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亟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寻找强大可靠的精神动力和发展潜力。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继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积极探寻新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并将其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精神动力和重要源泉。回望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体现“民本思想”和“群众史观”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还是体现“天人合一”和“生态理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抑或是体现“和合与共”和“世界历史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印记和色彩,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凝练总结,最终提出“两个结合”的科学命题,实现了由“一个结合”向“两个结合”的伟大飞跃。

### 三、现实维度:“两个结合”内蕴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实践进路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继续“行”的密钥也在于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就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并由此出发,以“两个结合”中的“理论-实践-文化”三维框架结构为支点,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1. 高扬伟大旗帜,这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科学性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导,是指导人类社会实现自由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sup>[17]</sup>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由于对这一科学理论的忠诚坚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创新发展,才得以完成近代以来各项使命任务,创造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奇迹”。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就必须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但高扬旗帜绝非一句空话,而是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所谓“守正”,就是要守真理之正、守信仰之正。其中,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新理论成果,深刻把握蕴涵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要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创新”,则是要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切实以自信自强、主动有为的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让真理之光始终照亮我们未来的前行之路。

#### 2. 立足鲜活实践,这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现实依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回望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自觉立足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鲜活实践的基础之上,以各种具体的、特殊的方式或形态予以呈现,如立足法国社会主义实践而呈现的《法兰西内战》、立足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呈现的《哥达纲领批判》和立足东方世界社会主义探索而呈现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历经百年而成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注重科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立足鲜活实践、“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3]5</sup>这一实践要求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sup>[2]60</sup>。我们必须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世情、国情和党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调整,善于捕捉时代课题,持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时代问题;坚持人民立场,扎根中国人民奋进新时代的鲜活实践,充分发挥人民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在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伟大实践的基础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3. 赓续传统文化,这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深厚沃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深厚的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了自身“共产党人”这一身份定位,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同时也明确了“中国人”这一民族定位,始终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真正实现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旧瓶”装上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新酒”,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可以说,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血脉,始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着动力和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sup>[2]18</sup>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首先要注重结合,在明晰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之上,既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校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方向,也强调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使二者真正做到交融相长、相映生辉;其次要注重扬弃,既要汲取中华文化中“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安不忘危”“以和为贵”等优秀成分,也要舍弃中华文化中“尊卑有序”“宗法思想”等已不适应时代需求的陈旧内容,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丰厚给养;再次要注重创新,大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用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二者形神一致、有机统一。

## 四、结语

综而观之,理论、历史、现实既是准确把握“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的三个维度,同时也是一个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机理的理论维度,是“两个结合”科学性的学理支撑;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流变的历史维度,是“两个结合”传承性的历史之源;内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方向的现实维度,是“两个结合”实践性的未来指向。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唯有高扬伟大旗帜、立足鲜活实践、赓续传统文化,切实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来深刻把握“两个结合”这一科学论断,才能认清机理、明晰历史、观照现实,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0.

[8] 礼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48.

[9]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10]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7.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0.

[15]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8.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5.

[责任编辑:毛丽娜 武威]



引用格式:陈鑫. 理论、历史、现实: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三重维度[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19-26.